

旨，而這也是民族史學界共同關注的議題。近年來，民族史研究經歷一個變化，就是從傳統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向族群話語下的民族史研究轉變，這一轉變的核心即是關注研究對象的主體性的問題，反思研究者所面對的文獻及文獻生產背後的族群意識，關注他者的表達與自我表述之間的微妙關係，及這微妙關係背後所蘊含的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尤其是通過挖掘本族群的自我文獻，從我者的角度與自我的聲音來重新審視歷史上的族群議題，完善此前僅依賴漢文獻的研究，並同時關注族群與區域歷史進程的關係，重建關於民族史的敘事，是當下民族史研究的大勢所趨。

溫春香

贛南師範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359頁。

今天的人都知道科學時代的「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部書，確切點說，是指經過朱熹編定與解說的「學庸論孟」。它們和《易》、《書》、《詩》、《春秋》、《禮記》所代表的「五經」構成明清科學的核心內容，立於官學，在上是不可撼動的國家意識形態基石，在下是家傳戶誦立身榮名的教科書。宋代理學所確立的這一套政治、社會、道德和日常生活秩序，漸漸成為所有人思考和言行的綱領。「四書」之中，《大學》的位置特別重要，在精研覃思的過程中，有很多學者、思想家陸續從各個角度對它進行修改訂正。晚明的顧憲成編《大學通考》、劉斯原編《大學古今本通考》等書，既是文獻資料匯編，又代表當時人對這一突出現象及其勾連起的諸多議題的關注。《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以下簡稱《變動不居的經典》）一書在中晚明具體的政治、思想、學術、制度、出版、傳播語境下，揭示明代林立的《大學》改本及相關議題的脈絡與意義。

除去第一章緒論和第八章結語外，全書分上編「文本競爭與思想創新」和下編「衝擊制度與影響社會」兩大部份，各涵蓋三章的篇幅。

第二章以時代思想鬆動、對朱子《大學》產生質疑進而結集刊印古本《大學》為始，以王陽明、湛若水、方獻夫等人圍繞《大學古本》的不同態

度和取徑為主軸，探討這些分屬學侶、師徒的理學精英們在參與「改訂」話題過程中的進退、分合，揭示中晚明理學內部由經典文本的轉換帶動的新思想、新分歧和新競爭。

第三章以魏校——他與陽明、甘泉等人同時代而略晚——及其追隨者為主角，梳理他們參與《大學》文本角逐的始末。作者以魏氏與眾不同的《六書精蘊》、《大學指歸》等著作為核心，詳細介紹它們由復原「心畫」（即古文字）來訂正《大學》文本的理路。

第四章則着重在概述此時蜂起、且為前面兩章所未述之改訂文本的特點，並進而整理文獻，呈現一個眾說紛紜、各自為言的整體面貌，足見這種圍繞真理闡釋權的競爭之激烈。

第五章以林希元、唐伯元、管志道、張世則、高攀龍等不同時期人物的個案為單元，考察他們不約而同地謀求自己的《大學》改本著作進入官學體系這一努力。儘管朝廷在制度層面上對此反應相當負面，甚至決絕禁毀，但並不能阻止《古本大學》在更大範圍和程度上為時人所接受，更不能阻止同時期那些上疏自薦渠道以外的潤物無聲的滲透，或者說「侵蝕」。

第六章以經筵這一嚴肅又富有象徵意義的公開場合下臣子向皇帝陳述關於儒家經典的講章的義理分析和文本流轉為討論對象。作者觀察到，個別大臣在經筵場合仍然嚴格遵循朱熹的說法，而私下卻傾向《大學古本》，甚至有像高拱這樣在離任之後激烈批判過去的經筵講章和官方讀本的。作者不光為《四書直解》系列出版物清理出一個譜系脈絡，還揭示這些出版物將新學與舊學在同一個版面公開較量的視覺意義。

第七章以明代兩位書坊間紅人為個案：一位是無法斷定其書的真偽卻備受歡迎、掛名無數的狀元焦竑，另一位是富有商業嗅覺、製造無數受歡迎的出版物的袁黃，探討時文範本、家教寶典、《桃花扇》中的三山街的繁榮，如何共同參與「晚明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的糾葛和崩潰」。

第八章通觀《大學》改本在明中後期的存在及意義，它以思想鬆動作發端，以新文本在對上的制度與國家層面和對下的普遍社會層面的突破與洗刷為實踐，以嘉靖以後的進入繁榮的印刷業為推手，而以玄思冥想作為活躍其間的行動主體的內心支撐，促使明代社會的各個層面都發生轉型。

上述諸章是作者在明代紛繁複雜的文獻中梳理剪裁得出，它們單獨來看，有各自獨特的論述目標，展示出不同的文獻性格和相應的分析方法，有版本考證、文字訓詁、數據統計、文本細讀以及概念辨析。綜合而言，這部研究以書為核心，逐層擴大至作者、書的出版者、讀者、擁護者和反對者，

等等，整體上又構成一個完整的、目標明確的論述，將明代《大學》改本從零星到風行，參與者從理學精英到一般讀書人的過程和脈絡整理得非常清楚：理學家既在內部競爭話語權，又向外部尋求突破，一方面試圖進入國家制度的渠道，另一方面通過師生授受、出版運作、八股範文等方式發展受眾，影響所及，涵蓋整個晚明的閱讀群體，體現這套新學的強大生命力。

對於同在文史領域的包括筆者在內的讀者而言，這本書的意義存在於兩個方向。一是它的題目之重要，研究同時期知識階層和社會狀況的學者都應該關注。這部著作討論的對象《大學》是國家掄才選士的標準，是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共享的一套價值體系。作為教科書，它嵌合在官學和私學的制度之內，又不斷吸引思想精英的傾力參與。《變動不居的經典》以書籍的流傳、變異、境遇來燭照貌似恆常的制度內部的經典的轉換，不光是於思想史、科學史有意義，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也足以啟發讀者省思知識與概念之所從來。二是作者的方法和理念，足資借鑒。以最包羅萬象、事實上也最難收束的第七章為例，作者指出「晚明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的糾葛和崩潰，不僅體現在波瀾詭譎的『國本』、『黨爭』這類宏大議題上，也清晰地體現在焦狀元口授的講義、袁了凡編選的時文、三臺山人炮製的讀本，以及三山街書鋪發賣的萬卷牙籤上」（頁318）。可以看到被概括為「upside down & inside out」的近30年來蔚為大觀的諸多新方法、新視野的影子，但具體的論證和書寫又十分周到樸素，並不泥於某家某派的論說，頗似朱鴻林提倡的「尊重文獻、尊重實物」研究方法。

最後談談這部書帶來的啟發和思考。其一是在王陽明所處的明中期，即李夢陽等人掀起第一次詩歌復古運動時期。在很多文學史著作的描述下，常常看到「受到陽明心學（或者晚一些會用泰州學派）的影響」這樣的表述。在「龍場悟道」之前，王陽明曾經和日後將成為復古派重要領袖的李夢陽詩文唱和（李夢陽，《空同集》，卷59，〈雜文·朝正唱和詩跋〉，頁19）。他們是另一種意義的「識於微時」，談不上誰影響誰。而在正德初年，他們不約而同地在思想和詩歌創作的領域分別投入更古老的經典和典範的懷抱，是為「復古」。若暫時擱置「誰影響了誰」這種定論，他們各自的「復古」是否基於同一種內在驅動力下而作出的方向不同的探索，也屬於「轉型社會的共振」？這是這部書帶給筆者的思考。

其二是比較具體的疑問，有關高拱為裕王功課講讀而作之《日進直講》和被逐家居期間所作之《問辨錄》、《本語》諸書中關於《大學》態度截然相反的論說之分析（頁204-212）。高拱《問辨錄》十卷作於萬曆三年

(1575)。而在隨後的一節討論的《四書直解》恰是在萬曆元年(1573)年底由張居正發起的講章彙編付梓定例的產物,《大學》也在萬曆三年(1575)最早刊刻成書的這一批講章中。那麼,高拱在大約同時期的相同行為,僅僅能說明高級官員在經筵內外有「兩張面孔」,公領域需恪遵功令,私領域不妨隨心所至嗎?或說明在野逐臣高拱痛感「今是而昨非」,要和舊日的主張做一番論辯嗎?有沒有可能是兩代帝師針對經典解釋權的宣告與較量?尤其是高拱主政時不發聲,被逐後才致力四書問辨和教學評議,甚至臨終前不久還寫成揭示自己親歷的高層政治鬥爭的回憶錄《病榻遺言》,頗能看出他這種書寫的現實指涉和自證意味,不應該只放在理學內部的脈絡上看。需要澄清的是,筆者並不是要強行加入政治鬥爭這種所謂的「大歷史」,而是想指出,高拱著書辨析義理,固然要遵從理學的討論規範,但這種討論和戒絕人事、只回應學術史內部話題的著述不太一樣,他的寫作是有雜音摻入的。當然,這種雜音導致的「對話」具體落實在何種層面以及它在理學內部具有何種意義還需要審慎考量和細緻對照。

坦白說,高拱、張居正在經筵問題上的隔空較量與對話在本書中如果略過不提,也並不會有多麼大的損害,因為作者已直陳「全面跟蹤講章流出宮廷後的情況,並非本書的關注重點」(頁222),儘管高拱可以視作張居正這套書還在醞釀階段的密切關注者和可能的讀者,作者更關心的問題是《四書直解》的文本變動,是經筵講章到八股範本的轉變。事實上,掛着經筵講官大名的這批文本經過類似申時行的仰慕者以及申氏子輩的出版操作(頁253),實現雅向俗的落地並收穫真實的利益,無論書上印着張居正,還是徐階、高拱、李春芳,其象徵意義都一樣。而在書中所呈現的有一定素養的理學家那裡,在「課士」與「私撰」之間,早就已是「一個《大學》,兩種表述」,但是一川奔入萬山中之後,在焦竑、袁黃、余應學等個案呈現出時而折中、時而鮮明,甚至流蕩混雜、全無定見的景象。比起證明一種學說的最終獲勝,筆者更關心的是,整個晚明在許多文化領域都出現高雅文化面臨通俗文化的進逼而不得不重新自我定義以區分彼此的現象,那麼,在本書所構築的以《大學》改本為標目的這口大鍋中,那些精英的、具有一定話語權的思想家在這個問題上是怎樣應對的呢,他們翻騰向了何處?

楊彥妮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